

论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中的荆轲形象

郑淑文, 鲁家旭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5日

摘要

荆轲刺秦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事件, 荆轲的人物形象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在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被重塑与丰富。本文旨在梳理史实基底与文学象征中的荆轲形象。通过文本细读与比较分析, 本文发现: 以《战国策》《史记》为代表的历史叙事, 通过选择、编排与文学化笔法, 建构了荆轲作为“侠义刺客”与“悲剧英雄”的立体形象; 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评, 则从政治伦理角度对其进行“去魅化”的批判性重塑; 而以陶渊明《咏荆轲》为代表的文学想象, 则超越了具体史实, 将荆轲升华为反抗强权、寄托士人情怀的精神符号。荆轲形象的动态变化, 揭示了历史人物如何在不同时代语境、不同文本载体中被持续阐释与再创造, 最终凝聚为一个承载复杂文化记忆的不朽形象。本文的研究, 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个案。

关键词

荆轲, 《史记》, 《资治通鉴》

On the Image of Jing Ke in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Shuwen Zheng, Jiaxu Lu

School of Publish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Received: June 9, 2026; accepted: July 5, 2026; published: July 15, 2026

Abstract

Jing Ke's stabbing of Qin is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Jing Ke's characters are not fixed, but are constantly being reshaped and enriched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image of Jing Ke in historical base and literary symbol.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ext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represented by "Warring States Policy" and "Historical Records" constructs the three-

dimensional image of Jing Ke as a “chivalrous assassin” and a “tragic hero” through selection, arrangement and literary brushwork;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represented by “Zizhi Tongjian” critically reshapes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thics.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represented by Tao Yuanming’s “Ode to Jing Ke”, transcend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s and sublimates Jing Ke into a spiritual symbol of resisting power and pinning the feelings of scholars. The dynamic change of Jing Ke’s image reveals how historical figur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terpreted and recreated in different times and in different text carriers, and finally condensed into an immortal image bearing complex cultural memories. This study provides a classic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Jing Ke, “Historical Records”, “Zizhi Tongjia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导言

从古至今, 荆轲刺秦(公元前 227 年)的故事不断被人们记忆和述说着。然而,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 并非纯粹的历史真实, 而是一个被反复书写与想象的文化建构物。自汉代以来, 关于荆轲的记载与咏叹绵延不绝, 其形象在史家的刀笔与文人的诗心之间流转, 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荆轲这一人物不仅活跃于史书典籍, 更在诗词、小说、戏曲等各类文学作品中不断被演绎, 成为承载民族侠义情怀的重要文化符号。从《战国策》到《史记》, 从陶渊明《咏荆轲》、柳宗元《咏荆轲》、陆游《读史有感》, 再到何景明的《易水歌》等等历代文学艺术作品对其描绘抒写来看, 或赞其悲壮之举, 或表达同情之心……, 总之, 荆轲形象在中国历史上, 闪耀着一缕耀眼的光芒。

本研究以“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的双重视角切入, 旨在系统梳理荆轲形象的生成与演变机制。通过对《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及陶渊明《咏荆轲》等关键文本的考察, 本文试图回答: 不同性质的文本如何塑造了差异化的荆轲形象? 历史事实如何被叙事策略所形塑, 又如何升华为超越时代的文学意象? 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荆轲这一具体人物的理解, 更能管窥中国传统文化中, 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如何交织互动, 共同参与民族精神与集体记忆的构建。

2. 文献综述

关于荆轲的研究, 历来是文史学界的热点, 成果丰硕, 已形成一个层次丰富、方法多元的学术谱系。现有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

其一, 文本源流与文献关系研究。此领域是荆轲研究的基石, 学界对荆轲相关历史文本的研究呈现“考据与解读并重”的特征, 核心围绕《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及《燕丹子》的史料渊源与文本关系展开。荆轲刺秦叙事主要集中于这三部重要典籍。学者普遍关注三大核心文本的传承脉络。有关《史记》与《战国策》两个荆轲刺秦文本间关系的理解, 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战国策》抄自《史记》。二是认为《史记》抄自《战国策》所据文献。第三种看法与第二种相近而略有不同, 认为荆轲传大部分文字仍出自《战国策》所据文献, 但荆轲刺秦王一节应是司马迁自撰。有关《史记》与《燕丹子》两文本间关系, 争论的聚焦点主要在于: 《史记》与《燕丹子》二者究竟谁先谁后? 是司马迁删改

《燕丹子》并补以其他材料完成《荆轲传》的写作, 还是《燕丹子》在《荆轲传》的基础上予以丰富拓展? 叶岗《〈燕丹子〉研究》通过全文对读与统计分析, 提出《史记》实为司马迁编纂而非原创, 且三者并非简单因袭关系, 而是基于相同或相近的“源材料”各自成书, 这一观点突破了此前“《史记》因袭《战国策》”的单一认知[1]。张海明通过对唐宋文献的细致考据, 研究指出: 今本《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一章, 很可能并非司马迁所依据的原始文献, 而是隋唐之际的学者根据孔衍《春秋后语》等文本, 转抄、补入《战国策》的[2]。将《史记·荆轲传》的地位提升为现存最早、最完整、最核心的独立叙事源头, 其叙事独特性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再创造”。他还通过文本比对及结合江淹本事进行考察, 指出《燕丹子》并非出自秦、汉人之手, 更非先秦古书, 而是南朝江淹的拟作[3]。《燕丹子》是沿袭了《荆轲传》的基本故事框架, 在情节、人物、题旨等方面则大异其趣, 且其所增添变动并非得自民间传闻, 而是江淹据于现实处境所作想象之语[4]。

其二, 形象流变研究。部分学者已注意到荆轲形象的历史变迁。学界共识在于《史记》奠定了荆轲“侠义英雄”的核心基调, 通过补充“好读书击剑”细节, 交代荆轲基本身世背景, 增强了荆轲事迹的完整性。孟蒙立足于《史记》, 讨论了司马迁笔下荆轲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 将荆轲形象跟其他刺客形象对比, 体现出荆轲形象的特殊性[5]。而《资治通鉴》的“匹夫之怒”评价, 则代表了儒家史学观对荆轲形象的理性解构, 对于刺客的行为, 主张“礼乐教化”的儒家是不赞成的, 展现了历史叙事的价值多元性[6]。《史记》说荆轲等人“义或成或不成”, 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通鉴》却说“以要离为蛛蝥之靡, 聂政为壮士之靡, 荆轲为刺客之靡, 皆不可谓之义”。司马光直言不讳地表明否定的态度。荆轲刺秦, 就是不义!

其三, 单文本的文学解读。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史记·刺客列传》文学成就的分析, 或对陶渊明《咏荆轲》等诗歌进行赏析, 强调司马迁的抒情笔法或陶渊明的寄托情怀。比如, 武建雄就陶渊明的《咏荆轲》, 分析其在内容与风格上与其他咏史诗以及隐逸诗明显区别。指出: 陶渊明有意强化了荆轲的英雄形象与游侠色彩, 究其原因, 源于自己豪放的个性、有志难酬的现实困境与少年时的侠义思想[7]。然而, 将不同性质的核心文本(正史、编年史、诗歌)置于同一框架下, 系统考察其叙事策略与想象方式如何具体地、差异化地塑造荆轲形象的研究, 尚显不足。本文正是力图在此薄弱环节上作出努力, 进行一种比较文本学意义上的系统梳理。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与比较分析法。

文本细读: 深入研读《战国策·燕策三》《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部分)、《资治通鉴·秦纪二》及陶渊明《咏荆轲》等核心文本。不仅关注其叙述的内容, 更细致分析其叙事策略、语言风格、细节选择与省略、以及直接的评论。

比较分析: 将上述文本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共时性比较主要分析同一事件在不同体裁文本(如《战国策》与《史记》)中的叙述差异; 历时性比较则分析同一人物形象在不同时代文本(如从《史记》到《资治通鉴》再到陶诗)中的演变轨迹, 并关联时代思潮与作者意图进行阐释。

4. 历史与文学中的荆轲

4.1. 历史叙事的奠基与形塑: 从《战国策》到《史记》

关于《战国策》与《史记》中荆轲文本的关系, 以及司马迁是否进行了“文学再创造”, 学术界确实存在深入探讨, 但结论比“直接借鉴并升华”更为复杂。目前的主流研究并未简单认定司马迁直接抄录并改编了今本《战国策》, 而是揭示了三种可能, 并从中可以清晰提炼出司马迁“文学再创造”的证据。

不过本文不对二者的文本关系进行深度分析, 仅按照此前“《史记》因袭《战国策》”的单一认知进行荆轲形象梳理。

《战国策》的策士底色与戏剧骨架: 作为最早的系统记载,《战国策·燕策三》奠定了故事的基本框架。其中的荆轲, 展现出鲜明的纵横家色彩: 他善于谋划(献计取樊於期首级与督亢图), 精于辞令(廷对秦王)。文本叙事紧凑, 对话精彩, 场景(如易水送别、秦廷行刺)极具戏剧张力, 但人物心理描写简略。荆轲形象更接近于一个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行动的“高级策士”或“侠义说客”。

《史记》的文学升华与悲剧铸造: 司马迁在《战国策》的基础上, 进行了伟大的文学再创造。其一, 立体化塑造: 开篇补充“好读书击剑”的细节, 赋予其文武兼修的品格; 浓墨重彩地渲染“易水送别”的悲壮气氛, 以音乐(“变徵之声”)、动作(“士皆垂泪涕泣”)、景物(“风萧萧兮易水寒”)共同烘托出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形象。其二, 细节化叙事: 对“图穷匕见”瞬间的紧张描绘, 以及事败后“倚柱而笑, 箕踞以骂”的特写, 使人物形象瞬间血肉丰满、气韵生动。其三, 情感化投射: 司马迁将自身的身世之感与对“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推崇, 倾注于荆轲身上, 使其超越了刺客身份, 成为一个承载着个人尊严、信义与反抗强暴精神的悲剧英雄。正是《史记》成功地将历史叙事高度文学化, 奠定了后世认知荆轲的经典范式。

对比分析《战国策》与《史记》的叙事焦点, 可以得出结论:《战国策》, 侧重展现“说客”言论, 荆轲是外交失败后不得已的“刺客”选择, 故事服务于记录纵横家思想。《史记》: 焦点完全转向荆轲本人, 通过“刺客列传”建立谱系, 深入挖掘其“信”与“报”的内在动机与人格特质, 使之成为悲剧英雄[8]。

4.2. 历史叙事的重构与批判:《资治通鉴》的伦理视角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代表了宋代官方史学对荆轲事件的重新审视。其叙述大幅删减了《史记》中富有文学感染力的细节(如易水送别的情感渲染), 仅保留核心事件过程, 行文简练、冷静。最关键的是文后的“臣光曰”史评。司马光从儒家政治伦理出发, 尖锐批判荆轲: 认为太子丹对荆轲是“豢养之私”, 而荆轲为报私恩“不顾七族”, 其行为是“以匹夫之勇, 逞于一击”, 并不符合真正的“义”, 甚至批评他“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 不亦愚乎!”。 [9]在这里, 荆轲的“英雄”光环被剥离, 其行为的合理性与价值遭到根本性质疑, “臣光曰”的评论将荆轲行为归为“匹夫之怒”, 弱化了其侠义色彩, 体现了儒家史学观对历史叙事的影响。这体现了历史叙事在不同时代意识形态下, 对同一人物可以进行“去魅化”的重构与截然不同的价值评判。

4.3. 文学想象的超越与升华: 从陶渊明《咏荆轲》到符号化意象

文学想象完全挣脱了史实考辨的束缚, 致力于挖掘人物形象的精神象征意义。陶渊明《咏荆轲》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诗中几乎略去所有具体谋略与过程细节(“图穷匕见”仅以“图穷事自至”一句带过), 而将全部笔墨集中于塑造一种精神气质: “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的英姿, “凌厉越万里, 逶迤过千城”的决绝, 以及“惜哉剑术疏, 奇功遂不成”的深沉慨叹。陶渊明将自身未能实现的济世豪情的愤懑, 投射于荆轲, 使之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符号——一个反抗暴政、慷慨赴义、充满悲剧力量的英雄化身。《咏荆轲》并非对历史事件的机械复述, 而是饱含诗人主观情志的艺术重构。诗作以细腻笔触详叙易水饯别的悲壮场景与荆轲毅然入秦的决绝历程, 在层层铺陈中高度颂扬了荆轲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侠义风骨, 字里行间满溢着诗人鲜明的爱憎之情。需明确的是, 荆轲本质上是一位刺客,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忠臣”, 但古代“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理念, 与“忠”的价值取向存在天然的精神共鸣。文学感咏的核心往往不在于拘泥于吟咏对象的本质属性, 而在于诗人借对象的某一特质抒情言志——陶渊明

正是抓取了荆轲“君子死知己”、为知己复仇的核心侠义内核,将个人忠晋愤宋的家国情怀与愤懑心绪寄寓其中,使诗作超越了单纯的咏史范畴,实现了对荆轲侠义精神的情感升华与价值重塑[10]。自此,荆轲在文学长廊中,主要不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可供历代文人咏叹、寄托各种情怀(如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反抗精神等)的经典意象。后世大量的咏荆轲诗、小说戏曲改编,皆沿此路径,不断丰富和拓展这一意象的内涵。

4.4. 互动与共生：形象塑造的合力机制

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并非彼此割裂。一方面,历史叙事(尤其是《史记》)本身包含了强烈的文学想象成分,为后世文学提供了最富感染力的故事蓝本与人物原型。另一方面,文学想象所强化的精神符号(如“侠义”、“悲壮”),又会反哺大众的历史认知,影响后世对历史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期待。二者构成了一种共生与对话关系:历史叙事不断为文学想象提供素材与支点;文学想象则不断为历史人物注入永恒的情感与价值,使其超越一时一地的具体史实,获得不朽的文化生命。荆轲形象的最终定格,正是这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4.4.1. 互动机制的学理阐释

从叙事学与文化符号再生产理论来看,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形成了一套闭环式的双向建构体系。历史文本承担着原型建构的功能,它划定了人物身份、核心情节与基本人格边界,构成文学创作不可脱离的叙事原型。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曲,后世所有关于荆轲的文学演绎,都依托于《战国策》《史记》所确立的叙事框架,这也是历史真实性为文学想象设置的基本限度。而文学创作则属于典型的符号再编码行为,创作者不再拘泥于史实考据,而是根据自身的精神诉求,对历史人物进行筛选、提炼、夸张与重塑,剥离事件的功利性,萃取人物的精神特质,完成从“历史人物”到“文化符号”的转化。

与此同时,二者还存在反向渗透的关系。经过文学想象渲染、传播的荆轲形象,会潜移默化地重塑大众乃至后世史家的历史认知,让文学塑造的“悲情英雄”形象逐渐成为大众心中的历史本貌。这种“历史奠基-文学升华-认知重塑”的循环过程,正是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深度交融的核心体现,也让荆轲这一形象跨越时代,始终保持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4.4.2. 形象演变的深层动因：时代政治环境与士人阶层的影响

荆轲形象在不同文本中呈现出褒贬、定位的巨大差异,并非仅源于作者个人立场,其背后是不同历史阶段政治格局、社会思潮与士人阶层生存状态的深刻影响。

战国至汉初,天下分裂、诸侯并立,传统礼法秩序崩坏,纵横之士、游侠之士游走于列国之间。彼时士人不再被单一的君臣礼教束缚,“士为知己者死”成为主流价值追求,个体气节、知遇之恩被置于极高位置。《战国策》诞生于这一乱世语境,自然侧重于凸显荆轲作为策士的谋略与游侠的担当;司马迁身处西汉初年,大一统王朝刚刚建立,先秦游侠文化、重义尚节的风气仍被士人阶层推崇,加之司马迁自身命运坎坷、怀才见辱,与失意士人产生强烈共情,因此《史记》极力放大荆轲重诺轻生、反抗强权的特质,将其塑造为悲剧英雄,这也是汉代士人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

两宋时期,理学兴盛,朝廷以文治国,极力推崇儒家礼教、君臣秩序与家国大义,严厉排斥私相复仇、匹夫犯上的游侠行为。宋代史学以“资治”为核心,强调史书的政教教化功能。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借鉴,在官方主流的儒家伦理视角下,太子丹因私恩谋刺强秦、荆轲因私恩以身犯险的行为,无疑违背了国家大局与礼法规范。宋代士人阶层以维护王朝稳定、恪守纲常伦理为立身之本,这也直接导致司马光对荆轲采取全盘批判的态度,完成了对荆轲形象的“去魅”。

东晋王朝政权动荡,门阀把持朝政,皇权衰微,社会秩序混乱,又恰逢晋宋易代的历史节点。陶渊

明作为坚守旧朝的士人, 怀抱济世理想却无处施展, 报国无门、守志艰难是当时一大批寒门士人的共同困境。传统忠君报国的路径被阻断后, 士人转而在历史人物中寻找精神寄托。这一时代背景下, 陶渊明跳出政治伦理的评判框架, 不再纠结荆轲“刺客”的身份, 而是放大其“死知己、抗强权”的侠义精神, 将自身的忠愤之志、失意情怀全部寄托其中, 也推动荆轲彻底转变为历代失意士人抒发情志的精神符号。

在不同时代政治环境与士人文化的驱动下, 荆轲形象不断被改写、重构、升华, 这也让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的互动, 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5. 结语

通过对《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及陶渊明《咏荆轲》等关键文本的分析, 可以清晰地看到荆轲形象被层层建构与演变的轨迹: 他首先在《战国策》中被记述为一个事件中的策士, 继而在司马迁笔下被塑造为一位血肉丰满的悲剧英雄, 又在司马光的史鉴中被重构为一个受批判的失义者, 最终在陶渊明及后世文人的歌咏中升华为一个反抗强权的精神符号。

这一过程生动地揭示, 一个经典文化形象的诞生, 从来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复现, 而是历史叙事与文学想象持续对话、共同生产的成果。历史叙事通过选择、编排、详略和笔法, 赋予人物基本形貌与初始价值; 文学想象则通过提炼、夸张、抒情与象征, 赋予人物超越性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共鸣。荆轲, 正是在从“燕京刺客”到“易水悲歌”的文本旅行中, 从历史走进了心灵, 从一个具体的失败者, 演变为一个承载着信义、勇毅、悲情与反抗意志的不朽文化意象。研究这一过程, 不仅深化了对荆轲本身的理解, 更为我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与文学复杂而深刻的互动关系, 提供了一个极具典范意义的案例。

参考文献

- [1] 叶岗. 《燕丹子》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612.
- [2] 张海明. 《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28(1): 94-113, 161.
- [3] 张海明. 《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 21-37.
- [4] 张海明. 《史记·荆轲传》与《燕丹子》比较论——兼谈《燕丹子》的小说文体属性及意义[J]. 文学评论, 2013(3): 152-163.
- [5] 孟蒙. 论《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形象的复杂性[J]. 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 2014(5): 96-101.
- [6] 贺根民. 荆轲形象的文学移位与道德人格的嬗变[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2(1): 87-92.
- [7] 武建雄. 从《咏荆轲》诗看陶渊明的侠义思想[J]. 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4): 49-52.
- [8] 张桂萍. 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1): 122-133+191.
- [9]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3: 916.
- [10] 龚斌. 陶渊明“忠愤”说平议[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2): 33-39.